

传统村庄的

CHUANTONGCUNZHUANGDEXIANDAIKUAYUE

现代跨越

张军 王晓毅 王峰 著

我国农村有几十万个行政村，这些村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对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心和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学者，都将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不约而同地放在村庄层面。例如，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尽管近百年来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

0.1

山西经济出版社

传统村庄的

CHUANTONGCUNZHUANGDEXIANDAIKUAYUE

现代跨越

张军 王晓毅 王峰 著

王峰

山西经济出版社

责 编:曹恒轩
复 审:宋晋平
终 审:赵建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张军,王晓毅,王峰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1

ISBN 7-80636-605-9

I. 传... II. ①张... ②王... ③王... III. 农村—现代化—研究—中国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878 号

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

张 军 王晓毅 王 峰 著

*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红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26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

ISBN 7-80636-605-9

F·590 定价:16.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传统与现代化	(9)
第一节 概念与范畴	(9)
第二节 现代化理论	(22)
第三节 工业化道路	(32)
第二章 现代化受挫	(37)
第一节 前车之鉴	(37)
第二节 自力更生的现代化	(51)
第三节 中心—边缘模式	(55)
第四节 有成长无发展	(73)
第三章 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	(81)
第一节 现代化积累	(82)
第二节 村庄资源整合	(88)
第三节 非均衡的农业现代化	(108)
第四节 制度创新与工业化	(121)
第五节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	(128)
第四章 传统的延伸	(137)
第一节 两种传统	(140)
第二节 村庄的社会变迁	(148)
第三节 现代化与村庄传统	(157)

第五章 村庄社会分化与整合	(176)
第一节 原有村庄中的关系	(177)
第二节 社会分化	(182)
第三节 社会冲突	(188)
第四节 结构与村庄内部的紧张	(191)
第六章 村庄组织与村庄控制	(207)
第一节 组织及相关制度变迁学说	(207)
第二节 村庄组织与村庄控制	(223)
第三节 中外村庄组织与控制模式比较	(234)
第七章 村民自治	(244)
第一节 国家和农民关系的重建	(244)
第二节 村民自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258)
第三节 村民自治中的委托—代理效用分析	(263)
第四节 村民自治的若干思考	(267)
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285)

导 言

我国农村有几十万个行政村，这些村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对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心和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学者，都将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不约而同地放在村庄层面。例如，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尽管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也就是我们在今天看来的现代化社会，但中国社会的基层依然是乡土性的。正是这种乡土性，支配和影响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也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理解了乡土社会的概念，才有可能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费孝通，1984），所以费先生以村庄为基本对象，写出了颇有影响的《江村经济》，并展开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研究。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从市场体系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村庄的社会分化、演进，并提出了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不管是费孝通还是施坚雅，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研究结论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说，无一例外都是以村庄作为研究对象，这足以证明村庄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那么，何为村庄？如果我们将村庄看做是一个社区的话，那么村庄首先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上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共同的心理认同，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是自己人，归属于同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有清晰的边界。村庄有多种力量保持村民的

归属感和村庄的完整性。在这些多种力量中，有在历史上形成的自下而上构建村庄认同的、自然的、主要存在于自然村中的力量，王斯福将其称为传统的力量；也有一种是国家权力介入后产生的自上而下地村庄认同的力量（Feuchtwang, 1998）。相对于我们所研究的近 20 年来现代化发展而言，以上这两种力量都是作为传统而存在于村庄之中，并对村庄的发展、从而对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起着重要作用。

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一种直线式，即传统因素——往往被认为是落后的因素——逐渐消亡，现代因素——往往被认为是先进的因素——取代传统因素的先进取代落后的简单过程。也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在这样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过程中，村庄中的传统因素都对现代化构成障碍。实际上，影响传统村庄现代跨越的因素很多，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细细划分无非来自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即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充分性，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经济学上的成长和发展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理论范畴。经济发展所强调的是国民经济总体的结构变动和部门间的关系，而经济成长在本质上却是一个部门过程。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强调的是国民经济活动总体质量的提高，而经济成长强调的则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发展速度的快慢（刘迎秋等，1998）。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的实践过程来看经济成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其逻辑结论可以演化出以下三种结果：其一，有经济成长无经济发展；其二，既有经济成长又有经济发展；其三，既无经济成长又无经济发展。1950 年～2000 年的 50 年里，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前 30 年的有经济成长无经济发展，和后 20 年的既有经济成长又有经济发展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村庄经济的现代化跨越步伐也不相同。如果我们将中国未能

在近、现代历史时期实现与日俄同样辉煌的现代化成就的原因(已有的研究表明,在日俄现代化初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动条件也已经成熟,甚至比日俄还要好, Cyril E. Black, 1975), 归因于晚清帝国的腐败无能, 中央财政能力的日趋弱化, 外国列强入侵造成帝国权威丧失殆尽, 以及人民大众缺乏对现代化的醒悟等等的話, 那么,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发展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结果, 主要归因于现代化发展模式下形成的经济成长格局, 以及与发展模式、经济成长格局相一致的经济制度差异。

计划性、集中性和同一性是 1950 年 ~ 1980 年现代化发展模式形成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表现。为了保证重化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 甚至可以用计划取代市场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 甚至可以放弃一贯倡导的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的地方积极性, 加强中央集权, 甚至可以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强行将不同生产力水平下形成的经济群体和组织, 同一在公有制的经济组织形式内并按照公有制组织模式约束其行为。这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虽然换来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 但却牺牲了农业、农民和村庄的发展利益, 在国民经济生活中造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即先进的工业部门与落后的农业部门、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村庄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时并存, 理所当然受到了农民与村庄的抵制。这种抵制最终演化为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重新修正, 以及与这一模式修正相一致的经济体制变革。

1978 年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与其说是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要求的结果, 不如说是现代化发展模式修正对经济制度要求变革的结果。1978 年以后的现代化发展, 并不是原有现代化的终止和新的现代化的开始, 而是原有现代化的继续。它与前 30 年现代化发展的不同在于: 经济发展上放弃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 转而强调国民经济总体的结构变动和部门间

的关系，即国民经济活动总体质量的提高。其主要特征是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全面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村庄社区，以及农民的制度博弈中，国家权力逐渐从村庄层面的某些经济和政治领域退出，赋予了村庄更多和更大的自主权，推动了村庄经济组织、经济模式的多样化发展。一些传统的因素，如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家族制度、社会关系等，被作为资源使用，并在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过程中表现出积极推动作用（折晓叶，1997）。

传统村庄现代跨越过程中，一些传统因素确实被先进的因素取代，但也有一些传统因素被保留下来，或正在村庄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经常在一些经济十分发达的村庄观察到这样的情景，如果按照人均收入、居住及生活的方便程度等条件来衡量，这些村庄的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低，但依然保留了传统社会村庄的某些制度特征或因素。从村庄发展的逻辑关系上研判这一现象，其结论在于村庄社会结构的整合不充分或不彻底。

村庄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村庄社会发展也缺少经济发展呈现的多样性，是村庄社会分化不充分，村庄社会结构不能进行有效和彻底整合，村庄制度得以保留的根本原因。一种观点认为，村庄是一种最为传统的制度，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进入村庄并完成对村庄的重新构建，以及村庄经济的现代化，村庄将逐渐解体。但是，近 20 年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却表明，村庄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解体，在很多时候，随着经济的发展，村庄表现出了更大的排他性。一些传统因素，如村庄认同和村民身份的识别，反而有所加强和也更为明确。

为什么在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过程中，村庄的经济发展已呈现现代特征，但村庄内部的矛盾和紧张关系，未能得到缓解反而日益加剧；村民的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但并未带来村庄更大的对

外开放，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村民身份的神圣不可侵犯，反而更加强了村庄保留很强独立性的需要。在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过程中，自下而上形成的传统村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村，因其经济功能和行政功能的逐渐丧失，特别是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向行政村集中，已经名存实亡。但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形成的村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行政村，不仅在形式上保留其完整性，而且在功能上因垄断了村庄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而有所加强。

经济的现代化，虽然扩大了村庄和村民的对外联系，但是，并没有给大多数村民带来摆脱依靠村庄的条件。相反，在这些村庄中，当村民利益受到外部侵害时，大多数村民理所当然的要求村庄成为村民利益的保护者。村庄只保护有村民资格的村民利益，因此，村民身份是得到保护的前提条件。村民为了得到保护，必须强化村庄的认同，这是实施保护的基础。这样，村庄作为最传统的制度获得了其成员的支持和继续存在的条件。典型村庄的发展经验说明，随着外部社会的进入，村庄并不必然从团体型村庄发展为开放型村庄。由于国家在建构村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村庄被塑造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尽管村民的收入已经主要不依靠村庄，但是作为村庄的一个成员，村民身份是明晰的，村民对村庄依然有着强烈的认同。

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村庄的紧张。在国家与村庄，政府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因现代化发展需要产生的互动关系中，村民往往处在孤立无援的位置，或者说处在最弱者的地位。他们将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原因归于村庄干部，但从村庄实际发展的情况看，已经不仅仅是干部个体行为的问题，村庄紧张是村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这种结构性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解决，将会给村庄的现代化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对村庄的紧张问题给

予高度的重视。

民主化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在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过程中，可以说刚刚起步，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村庄实行村民自治。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与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组织形式不仅对社会控制程度、控制效率，以及社会管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左右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村庄社会变迁过程中，组织结构上的失效——解体——重构和创新——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过程，就是社会控制不断创新、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这样一来，现代化进程中对村庄控制的研究，在宏观层面即国家与村庄之间和微观层面即村庄内部之间的社会控制的研究，被统一到对村庄实施控制的组织形态的研究上。

国家权力进入村庄，用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社会团体组织取代其他社会组织成为村庄中的惟一合法组织，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人民公社时期村庄组织与控制模式的主要特征。党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和控制模式，最好地将生产资料占有的村庄生产模式，与集中的村庄政治和控制模式结合起来，因而完全符合国家集中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与模式的需要。这种组织与控制模式存在的基础是：国家权力全面介入村庄事务；村庄组织对村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两者互为条件和基础。因此，一旦国家权力对村庄经济与社会事务的介入有所减弱，或表现出国家权力从村庄事务中的退出，村庄原有的组织和控制模式将失去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也就意味着出现新的村庄组织和控制模式产生的机会。

1978年以来，国家现代化目标和发展模式调整下出现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三个方面为村庄组织和控制模式的变革创造了条件：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国民经济收入更多的向个人集中，经济利益的个人化倾向，为产生马克思所说的“市民阶层”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二，村民已成为或正在逐渐成为村庄公

共产品的投入主体，因此，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都有权力参加村庄事务的管理，或实行自我管理；第三，以代表国家权力从村庄层面退出为标志的村民自治的实行，将推动村庄层面各种组织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在村庄层面出台符合村庄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安排。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新的村庄组织和控制制度形式，虽然赢得了村民的欢迎和支持，但是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完善方面，而且更主要的是来自原有政治权威丧失过快导致的村庄社会失衡和紊乱；在村庄社会出现失衡和紊乱借口下出现的传统政治复归；以及在村民自治制度实行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影响。克服挑战一要坚持村庄的政治民主化建设进程不动摇；二要通过制度规范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政经关系，国家与村民的关系，只有在正确处理这几种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缓解和解决村庄内部与外部的紧张关系；提高村庄经济与民主的透明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组织，用正式组织和制度，替代非正式组织和制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村庄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增强村庄的社会功能建设。

现代社会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广泛存在，极其普遍。M. Jensen 和 W. Meckling 认为，代理关系存在于所有的组织和合作性活动中，存在于企业、政府机构的每一个管理组织层级上。斯蒂格勒甚至认为，只要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委托代理问题就会产生。代理关系之所以产生，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个人能力的约束和片面性，它是基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发展，伴随利益优势的比较而产生的，并以人类需求的多样化为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引入委托代理制度，不仅可行，而且还有助于解决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通过委托代理制度，可以明确农民作为委托人所应享有的权

利、责任、地位和利益；明确代理人的职责；提高初始委托人的行为能力，规范代理人的行为准则；把农民吸引到政治体系中来，推动村庄政治结构的现代化。

第一章 传统与现代化

人类社会从远古到今天的发展，始终体现了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用当今生活中最常见的语言来概括，就是追求并努力实现现代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摆脱传统和实现现代化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第一节 概念与范畴

现代化理论是对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较高阶段的社会实践过程的总结。人类社会在经历了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深刻反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主流。战后，工业化国家不仅面临着将经济从战时状态转变为平时状态的问题，而且，一些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工业化国家，还面临着如何重建家园、恢复经济的重任。然而，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角，已不再仅仅是工业化国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正逐步成为世界发展舞台上更受关注的对象。

无论是工业化国家抑或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深刻的体会到一个协调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各自的发展，而且还会推动世界的进步与繁荣。因此，缩小工业化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便成为有识之士的广泛共识。然而，出自利益的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目标、道路和手段的选择上，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则南辕北辙。

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来自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总结。因而，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面临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时，摆在它们面前且惟一可供参考的样本，也只有工业化国家一种模式。可是，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条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工业化国家早期现代化不同：（1）形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工业化国家一方，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不平等的政治格局。（2）工业化国家对资本的垄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获取资本的成本较高。（3）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垄断，一方面限制了技术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采用新技术的时间被大大拖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升级，从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4）世界范围内的市场虽然不会对发展中国家关闭，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市场对后来者来说，不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工业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占有，将对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市场发展本国经济不利。这些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影响，至少在工业化国家早期现代化时还未出现。因此，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采用工业化国家现代化道路，不能说一定不能成功，但至少与现实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

任何学术研究和讨论，都是建立在对研究和讨论命题概念与内容统一的基础上。因此，在我们进入到对传统村庄向现代社会跨越的深入讨论之前，首先要在理论上搞清楚何为现代？何为现代化？何为传统？从历史科学划分的角度看，“现代”是与古代相比较而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逐渐放弃了基于基督教的历史分期，开始使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期法，现代就作为表述当代社会性质的概念而与古代的概念相对应（C·E·布莱克，1966）。因此，我们看到，人类社会进步的方方面面，都笼统的被冠上现代进步的高帽，而那些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事物、思想观念等等，都被视为

传统和守旧。从这一点来说，早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简单的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传统—现代的直线式发展模式，由此在研究中引入了现代与传统的概念。这样一来，现代和传统的概念就突破了历史学家划分历史时的涵义，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一、传统的解析

我们在这里反复采用的传统概念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指社会的传统性。社会的传统性是由该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内容决定的。C·E·布莱克认为，传统社会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经济活动缺少明显的分工，以及由分工导致的高度专业化生产。由于专业化程度低，农村社区事实上是自给自足，国内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商品、服务交换的发展受到限制。知识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远没有现代社会突出。因此，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低，而且国民生产总值能够用于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也较弱；社会发展相对而言是停滞的、封闭的、静止的。个人一般主要和家庭、地方社区以及所属的职能团体发生联系，并由此形成社会组织的基础。尽管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较之现代社会严重，但是对大多数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来说，并不愿意进行社会流动和希望改变地位；政治上由于缺少高度有机的科层体制来维持法律章程，同时，国家缺少同社会成员的密切联系，也很少能够通过民主化手段实现政治上的整合，因此国家在履行职能和进行管理上缺少效率。^① 德国社会学家特尼斯认为，传统社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1）很少有劳动分工，角色专门化的程度很低；（2）家庭是社会中的最重要单

^①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位，亲属关系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3）大部分社会关系都是个人的，互动带有浓厚感情色彩；（4）人们的行为主要是由风俗习惯和传统来调节。因此，特尼斯又将传统社会称之为礼俗社会。^①与特尼斯的观点相同，塔尔科特·帕森斯沿袭了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来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所不同的是他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界，建立在人的行为和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五个行为模式上，因而形成了五个模式变项理论（孙立平，1992）。^②帕森斯关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划分的学说理论来自于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他认为：将系统一功能（模式—变量）体系视为分析大规模社会结构分化的主要参照系是有益的。这种分化的主要基础是一个系统满足与其情境有关的系统功能需要的过程。为此有5对两分法可用来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它们是：（1）自身利益与“大公无私”（Self-interest vs. disinterestedness），以后变为个人定向与集体定向；（2）普遍性与特殊性（Universalism vs. Particularism）；（3）功能的专一性与扩散性（Functional specificity vs. Functional diffuseness）；（4）情感性与情感无涉性（Affectivity vs. affectivity neutrality）；（5）质量先赋性与行为自致性（Quality-performance）。在帕森斯看来，集体定向、特殊性、扩散性，情感性和先赋性等行为模式的发展与变化，都与社会结构的变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社会的现代社会进程中，这5种因素将越来越衰弱，说明该5种因素属于“传统性”的定向因素。而与此相反的另外5种因素，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越

①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第1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②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第1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